

民国时期苏南乡村政制“突变”逻辑研究

姜 姝 严火其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聚焦于乡村政制的变革、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的互动、地方精英的嬗变等变迁元素,民国时期的苏南乡村政制发生了一场制度“突变”:一是国家行政主导的地方士绅自治兴起;二是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延伸,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权力关系发生了调整;三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苏南士绅和知识分子对乡村资本、经济 and 教育的投入,参与乡村社会改造并成为直接参与地方政治的主流力量。本文致力于回归历史制度主义的场景,把民国时期苏南乡村政制的“去道义化”制度突变置身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领域进行场域式分析,将“关键节点”“政治衰败”“失败国家”和“克里斯马”串联成理解苏南乡村政制“突变”逻辑的关键词:从主观因素来看,民国初期拥有“克里斯马式”魅力的乡绅阶层发挥了引领基层生活、节约交易费用、推进传统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功能;从客观条件来看,民国中后期“劣绅化”现象和全方位的“国家衰败”带来的“国家失败”是激进的制度“突变”的危机压力。

【关键词】民国苏南乡村;制度突变;克里斯马;政治衰败;失败国家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1-0120-09

A Research on the Logic of "Mutation" of Rural Political System in Southern Jiangs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Shu YAN Huo-q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olitical syst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rural society, and the transmutation of local elites, an institutional "mutation" occurred in the rural political system of southern Jiangs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Firstly, the rise of local gentry autonomy dominated by state administration; Secondly, the state power extended to the rural society, and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society was adjusted; Thirdly, the gentry and intellectuals with strong economic strength in southern Jiangsu invested in rural capital, economy and education, participated in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became the mainstream force directly involved in local politics. This paper is committed to returning to the scen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lacing the "de moralized" institutional mutation of rural political system in southern Jiangs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middle field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for field based analysis, and connecting "key nodes", "political decline", "failed state" and "Charisma" into the key words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mutation" of rural political system in southern Jiangs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facto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

[收稿日期] 2022-05-09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城归治村’在中国基层政治中的‘新位势’研究”(2020SJA0059);
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面上项目“‘城归治村’在中国基层政治中的‘新位势’研究”(SKYC2020025)

[作者简介] 姜 姝(1988-),女,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严火其(1963-),男,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

na, the gentry stratum with "Charisma style" char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the grass-roots life, sav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the phenomenon of "evil gentr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failure" brought about by the all-round "national decline" are the crisis pressure of radical institutional "mutation".

Key words: Southern Jiangsu countrysid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stitutional mutation; Charisma; political decline; state failure

引言

民国时期的苏南乡村,既承继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形态和“伦理本位”的文化理念,又出现了值得关注的“突变式”结构性变革。聚焦于乡村政制的变革、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的互动、地方精英的嬗变等变迁元素,民国的苏南乡村政制发生了一场制度“突变”^①(意指激烈性、急剧性和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一是地方士绅作为国家行政主导的县政改革中的一个“代理人”阶层崛起,其变迁规模和影响意义宏大深远;二是国家政权“下沉”至乡村社会,开始了国家修补、完善权力控制体系的尝试,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权力关系发生了调整;三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苏南士绅和知识分子对乡村资本、经济 and 教育的投入,参与乡村社会改造并成为直接参与地方政治的主流力量。

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和绅权之间的关系成为史学界争论的关键问题。瞿同祖、张仲礼、费孝通、秦晖等均有专著论及民国时期的乡绅自治,主要表达了“代理人说”的观点,认为乡绅阶层能够很好地填补“权力真空”,成为州县政府的“代理人”。此类观点和民国时期许崇灏《中国政治概要》(1943)、杨熙时《中国政治制度史》(1946)、钱端升《民国政制史》(1939)、陈之迈《中国政府》(1946)、胡次威《民国县制史》(1948)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国外学界颇有声望的杜赞奇、斯科特等人则更早地提出了“功能说”的观点。杜赞奇从村落机能论出发,分析了乡绅自治在维护村庄内部秩序、村费收支及村庄管理等方面的功能,认为村庄自身具有一定的自治能力,而绅权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功能作用^②。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小农道义经济学的研究中,认为佃农和雇工与地主存在保护-被保护的关系,也接受了一种提供安全感的保护性服务,使得他们免受“一阵细浪带来的灭顶之灾”^③。日本学者和田清在《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东京汲古书院1975年)中也强调了清末民初乡绅自治与国家社会关系内联互动的事实。

可见,民国时期的乡绅治村作为苏南乡村政制变迁的一种实践形式,其研究有值得进行理论创新和再诠释的空间。而在近些年关于民国绅权的文献中,政治学中的乡绅自治主要强调民主的问题,管理学则偏重理论研究,而在社会学中,乡绅自治所触发的是调节国家、基层精英和农民关系时所扮演的角色问题^④。本文并不对苏南乡村政制的变迁结果作价值判断,而是着眼于两个规律性问题:第一,绅权的存在和影响力是中国基层政治史上的“常态”;第二,民国时期的乡绅治村是基层精英政治的延续和表现。由此可见,无论是赞扬“新乡绅”制度功效的“自治功能说”,还是批评“劣绅化”带来政治衰败的“代理人

① 历史制度主义在处理制度变迁时区分了制度功能变化、制度演进和非连续性的制度断裂三类,参见杨光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②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

④ 相关著作可参见,田芳:《地方自治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崔之清:《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方昌华:《秦汉以来地方行政研究》,齐鲁书社,2010年;徐秀丽:《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中华书局,2014年;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等。

他律说”,都对民国时期的政制变迁寄予了制度性的想象。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是,本文致力于回归历史制度主义的场景,将民国时期苏南乡村政制的“去道义化”制度突变置身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领域进行场域式分析。这种制度突变是怎样被“点燃”的呢?我们可以从历史制度主义中寻找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两个问题:首先,在民国初期,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凭借“魅力”推动制度变迁?其次,在民国中后期,什么样的危机压力才会导致激进的制度变迁?

一、“关键节点”对照“正常时期”:苏南乡村政制的历史嬗变

在近代化浪潮中,民国时期的苏南政制出现了从“正常时期”到“关键节点”的结构性变迁。历史制度主义明确区分了制度变迁的两个不同阶段——“正常时期”(normal periods)和“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并且分析了“断续平衡理论”的生成机制:“在长时间的平衡稳定之后,静态的平衡会被危机打断并带来激烈的、非连续性的制度突变,此后则又自然进入下一段的静态平衡期。”^①

(一)传统时期(“正常时期”)的乡绅治村

在长时段的传统中国帝制时期,中国的社会形状和基本结构是“身家国天下”^②。由于受国家治理能力的限制,“皇权不下县”,乡绅成为州县政府的“代理人”,以较为低廉的管理“成本”与基层民众打交道,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堪称是传统基层治理的常态。“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具备这些道义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③所谓的“道义治村”,即强调伦理文化等行为规范,它的权威规范来自乡绅处事公正、为民谋利、恩德广施等优秀品质,凭借微观的政治运作契合普通民众的道德期待和村落社会的道义伦理。

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结构包括:一是以皇权为核心,形成了等级制的、自上而下的梯形社会结构;二是以家族为单位,形成了自然村落“自治体”的“蜂窝状结构”。苏南的道义制度主要起到了“纽扣”的作用,以一种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化”,实践着道义制度。这种“纽扣”作用表现为承担了部分与“官”相关的主要任务,如维护地方秩序稳定、保证税赋征收秩序和保甲。作为“纽扣”扣入基层,它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正统的“纽带作用”:对内相对封闭独立,保持了基层社会管理的稳定性;对外相对积极主动,积极向上级官僚机构争取资源。从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皇权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央政府对基层管控一直是处于较为细致的层面。在皇权社会的地方行政网络中,在县以下乡村的统治结构中,由士绅组成的地方中层成为替政府承担“一个广泛的社会管理范围”的管理者,因此弥补了某种程度的“真空”状态。随着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兴起,“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④。

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仍有控制功能,因而村落的自治性是相对第二性的,处在国家权力的强烈压制之下。“皇权不下县”,中央政府的政治触角无须延伸到基层,但基层的乡绅阶层能够有效地填补这一权力真空,成为州县政府的“代理人”,直接与农民打交道。从社会管理交易费用角度看,熟人社会的办事成本较为低廉。而对于乡绅来说,报酬基本相同,包括经理收入和聘用费。乡绅治村可以柔化基层治理的刚性色彩,以巧妙的第三方调解、家庭成员协商一致等“柔性”方式解决管理纠纷。这种非

① 相关研究结论散见于[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Kurt Weyland,“Toward A New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World Politics, Vol.60,January 2008;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② 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社会》2016年第2期。

③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页。

④ 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正式关系的精妙之处在于,作为中间阶层的乡绅,对上级官府和下级百姓两头都有动力做到最好。它能够不断适应传统统治形态下的“道义规则”,主动与国家权力进行双边互动。通过乡绅“道义”自治的方式,使得县以下的村落共同体成为政府动员乡村社会资源的重要制度手段^①。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乡绅治村的“恶政”形态,比如有学者曾叙述过“土豪劣绅夺人田地坟山、拷答佃农、强暴民女、榨取钱财”^②。然而,从漫漫历史长河来看,乡绅的自治形态勾勒了传统中国基层政治的重要“面相”,只是不同时代自治的内涵和类型各异而已。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士绅,凭借着道义政治、文化伦理等治理范式兼顾国家的税赋、管理和农民基本生活,维护着地方秩序的和谐稳定。乡绅们普遍具有一定的使命感和情感归附,被视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堪称实践了一种颇有特色的制度治村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在政治权力无法触及的最基层,富于现代色彩的“新乡绅”治村作为社会“软治理”的一种制度范式,发挥了引领基层生活、维护社会秩序、节约交易费用、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推进传统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功能。

(二)民国时期与基层政权合流的“新绅权”

在1911年至1949年的苏南乡村治理景象中,国家通过推行地方自治开始了强化权威体系的尝试,使县以下村落共同体成为政府动员乡村社会资源的制度手段,以乡绅为代理人节约了治理成本。以上级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为“社会资本”,乡绅凭借魅力型的“道义政治”获得绅权,办理国家的赋税、兵役差事,为普通民众提供调解、道路、灌溉、文化活动等公共品供给。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地方士绅纷纷进入了县内各种自治机构,在地方政治力量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有关学者研究,在民国初年,县以下的基层自治组织已经完全被士绅所控制^③。苏南地区因风气先进,加之立宪派力量集中并强大,“绅权”更是全面高涨,在民国初年的地方自治中,形成的几种具有公共权力性质的基层自治机构的首领人员均是当地绅士^④。依靠德望、文化和经济资本,乡绅治村承载了村民的道德理想期待并获得了一定的认可。此时的乡绅和国家共享一套意识形态和治理目标,在文化权力中完成治理行为,达到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治理效果,绅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

1. 民国初年士绅“嵌入”国家治理范畴

在传统基层政治图谱中,政治人物的产生机制往往是推荐制度,而且一向鼓励德高望重、年高辈长的人出任首长,即所谓的“长老政治”。根据民国初年的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必须成立自治机构以管理学务、卫生、道路、水利、农工、商务、慈善、公共事业、自治经费的征收使用以及据各地的习惯委诸绅董的事项,显然包涵了乡村的种种地方事务。而自治机构的领导人员必须从选民中产生,并且限定为“居本城镇乡连续三年以上”“有一定财产”“受过初等教育或相当之程度”等条件^⑤。

可见,出于稳妥考虑,乡绅精英往往是从众多的长老中推选出来,符合民众道义制度期待并出任首长。苏南自治机构分为决议机关和执行机关两部分,决议机关为议事会执行机关,县为参事会,市、乡为董事会。其议事会、参事会、董事会等机构领导一概为地方绅士所控制。例如辛亥革命后,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曾经担任吴江县议长。而各县的教育、警务、实业等部门也大多由地方绅士掌控。关于县之教育,设劝学所为全县学务之总汇,劝学所所长受县知事监督指挥,总理所内事务。在苏南,劝学所所长均有地方士绅担任,如文化名人钱基厚(钱钟书的叔爷)曾任无锡劝学所长,著名士绅丁祖荫曾任常昭县劝

①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张仲礼:《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岳麓书社,2012年,第306页。

②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语文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③ 内政年鉴编撰委员会:《内政年鉴(B)》,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01页。

④ 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江苏自治公报类编》(卷七—卷八),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425—426页。

⑤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第730—731页。

学所总董^①。这样,在地方自治推行的过程中,随着县教育机构的逐步设立,地方士绅开始进入并掌控教育部门。苏南地方士绅还一度掌控了警察部门。以无锡为例,1912年冬,北门光复门外开辟为商业区,又增设东区巡官1人^②。同时,将南延、泰伯、青城等地的民团改组为巡警局,经费由当地商铺负担,不足之数由地方乡绅捐款^③。实业更是由地方上有实力的士绅控制,如江苏各县设劝业员1人,受劝业道及知县之指挥监督,掌理县之实业及交通事项,大抵皆以地方绅士主持办理^④。

另外,苏南乡镇还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自治社会组织——市民公社,它由地方的进步士绅和有名的商人为组织者,由热心公益的市民结成团体,办理区内居民公益、慈善、学务、市政、卫生、交通、保卫事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地方管理权和建设权,在基层事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苏南乡镇,最有影响力的是常熟、吴江等地的市民公社。1922年,常熟城内外陆续建成虞南、东区、常境、九里、虞东、琴东、北区、南区、中区、西区、藕渠镇、熟境、琴北等十余个市民公社,影响涉及了各乡,各乡纷纷组织乡民公社。

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士绅向地方行政精英的转变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权力进一步向乡村“下沉”,士绅阶层逐渐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中,士绅重新整合为国家权力控制的新地方精英阶层。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一直努力建立县以下乡镇行政体系,将乡村政制进行重新整合设计,以区为基本单位,推进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区,以进一步强化对地方的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区公所区长人选^⑤。按照当时颁布的《区自治施行法》,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资格成为区长。在这样的“指挥棒”操控下,一批受过新式教育、与国民政府联系密切的新乡绅成为了乡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进入国民党基层政权,成为区公所的主导力量。到了30年代中期,区级政权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显然是这些新乡绅们;在苏南,有一大批经过区长训练班培训的新乡绅成为区基层政权的领导者。而在抗战时期,这时的地方士绅不再是独立于国家行政力量之外的一支队伍,乡镇长等地方官员和胥吏等战前“很多人都不愿干”的职位,转而成为地方精英的目标^⑥。一些追逐权力的乡村知识精英进入乡村政权,这段时期的基层政权管理者,“由传统的依靠道义和声望进行治理的地方精英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武化和劣化的地方势力”^⑦。

二、“克里斯马式”的乡绅治村:突变的主观因素

为什么民国初年地方自治和新乡绅治村能够行之有效?韦伯的观点是:“如果有类似克里斯马——也就是非凡的行动——那么有可能会产生历史变迁。”在韦伯看来,克里斯马型治理即魅力型治理,它“强调了对英雄的信仰和默示服从……这种信仰从内部出发锻造革命化的个人,同时具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以塑造事物和制度”^⑧。

民国时期,在国家权力体系进一步下沉、地方组织逐渐科层化的背景下,苏南士绅阶层大量进入地

① 曹余濂:《民国江苏权力机关史略》,载《江苏文史资料》第67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4年,第168页。

② 无锡史志办公室:《无锡最早的警察机构》,无锡史志网,http://szw.wuxi.gov.cn/web101/szkw/18941/shgc/518455.shtml。

③ 曹余濂:《民国江苏权力机关史略》,载《江苏文史资料》第67辑,第168页。

④ 张云伏:《地方自治大纲》,华侨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第38页。

⑤ 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第39辑,黄山书社,1999年,第236页。

⑥ 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84-585页。

⑦ 陈明胜:《晚清民国时期地方自治的内在困境及其现代启示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⑧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9页。

方行政,“绅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及向国家权力渗透,并且直接参与到地方政治活动中。这些苏南士绅通过“道义制度”积极参与乡村社会的改造与社会公益活动,富有逐渐科层化的现代色彩,为苏南乡村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凭借其“克里斯马式”的魅力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和文化自洽性。

(一)推进科技现代化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在政府对农村改造不足的情况下,苏南士绅出于发展生产的需要,积极参与乡村农业改造工作,宣传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为苏南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蚕丝业生产为例,蚕桑业是苏南地区传统优势产业,也占据了苏南经济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民国初年,由于蚕种不佳、技术落后等条件限制,再加上剧烈的国际竞争,苏南蚕桑业一度处于衰败境地。而拥有着雄厚经济资本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实业家和知识分子,凭借克里斯马式的魅力掀起了蚕桑改革浪潮,给一度衰败的苏南蚕桑业带来了现代化文明气息。

在苏南地区蚕丝业的革新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士绅或经济捐助,或知识技术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吴江县最初的蚕桑改良就是由地方士绅自发进行的^①。该县江震高等小学堂校长费元韞在东瀛留学、学成归国后,认识到现代科技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家乡的自然条件极宜栽桑,却因缺乏技术知识,农民植桑的成绩不佳,出现了“地有余利、人有余力”的尴尬局面。费元韞与同志“私相筹议,设法提倡”,将祖产20多亩平整后广植桑秧。他本人也积极补助了开垦建设经费,另“承同志协赞,将育蚕新法先行购桑试办”^②。在费元韞等人的努力下,当地的蚕桑生产技术有了一定提高。吴江绅士施省之先生也积极自主蚕桑生产技术改进工作,1933年,吴江震泽有关机构对秋蚕生产扩大指导范围,共设有20个指导所,指导所的建设曾得到该区士绅施省之先生的经费捐助^③。

丹徒县著名士绅冷御秋曾经遍访江浙主要产丝地,在考察后分析了蚕丝业落后的原因,认为江苏地区应该积极利用丘陵资源来发展蚕桑业,从而改善品种、提高生产技术、增强农业品质。冷御秋与士绅陆小波、严惠宇、蚕业专家葛敬中合作,在镇江丘陵地区发展蚕桑事业,并首创了“永安蚕种场”;与镇江地区的社会贤达合资,在镇江西郊四摆渡创办了“益民种场”(现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进行垦荒、植桑、制种研究、培育优良品种。这个试验场在当时是国内最先进的蚕桑研究机构,为苏南蚕桑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不久又在附近扩建分厂,称“均益蚕种”和“三益蚕种场”。这些种场的设立,都相应地促进了江苏丘陵区的养蚕业和制种业的迅速发展^④。

苏南士绅推进的丝业改革影响了村庄士绅的权力。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描述了这种情况:“当地领导人的地位,通过丝业改革加强了。当新的行政体制保甲推行时,吴江开弦弓村的陈杏荪(前清的秀才,曾担任村长)感到政府工作不合他的口味,于是退休了……陈先生于1926年与省蚕桑学校合作,开办了村中的蚕丝改进社。1932年,他担任丝厂厂长并正式负责建厂工作。他在丝业改革中,得到了权力和威望。虽然他在正式行政系统内并不担任职务,但陈先生现在仍然是村中有望望的领导人。”^⑤

而以蚕业为例,民国学者金晏澜指出,“江苏省蚕业推广事业已收相当之效果,厥故有两因:浒墅官女蚕校及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推广部遍社指导所者一,因无锡各丝厂设立蚕业合作社及面授班者二。”^⑥也就是说,在江苏蚕业发展过程中,除了蚕校及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的作用外,还有一股基本力量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股力量就是无锡从事蚕丝生产的实业家群体。

①《民政厅行政工作概要》,《江苏民政》第1卷第3、4期合刊,1935年,第3页。

② 吴根荣,徐友春:《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4页。

③ 同上。

④ 焦如桥、刘振东:《县政资料汇编》,重庆中央政治学校,1939年,第611页。

⑤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76页。

⑥ 金晏澜:《江浙蚕业概况及其趋势》,载《农矿公报》1930年第23期。

(二)推进教育现代化

民国时期苏南宗族以宗族义庄为主体,宗族义庄不仅通过赡养、救济族人,使宗族成员安于本分,以农为本,稳定在宗族范围之内,而且宗族还由族内走向族外,面向社会进行救济,成为民国时期社会救助的重要力量,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乡村秩序,苏南宗族义庄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地方社会;苏南宗族义庄在教育方面也贡献巨大,创办了大量学校,在苏南乡村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为地方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苏南宗族义庄通过兴办学校,形成了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权力网络,对地方社会的政治局势和权力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①。

同时,一批知识分子兴办现代教育,参与乡村社会改造,成为苏南社会治理中由一定影响力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苏南士绅也担当起重任,为提高农业生产者技术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各种学校特别是各种新式学校,例如女校和实业学校的兴办,多与绅商有着重要联系。无锡著名商人祝大椿,民国年间,在家乡无锡与丁仲按合资创办了2所平民学校;镇江著名商人严惠宇与路小波、冷通和等人组成校董会,于1937年4月1日创办私立京江中学(今镇江市第一中学)等^②。

(三)推进民生改良

苏南士绅不仅通过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改良来实现对乡村的影响力,更有一批以乡村社会整体改造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将新思想、新技术带进乡村,从而促进了乡村发展。黄炎培领导下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创立昆山徐公桥、吴县善人桥、镇江黄墟乡、上海县赵家塘等改进实验区,实施乡村普及教育,推广经济合作,改良农事、建设道路桥梁、改善卫生状况等公共事业。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制定出实验农村改进的目标和标准,即“应以经济、文化、政治三者连锁合一,改进农民整个生活,达到真正自治为目标。”“农村改进事业的成功,应以土无旷荒,民无游荡,人无不学,事无不举,全村呈现康乐、和亲、安平的景象为标准。”^③

在苏南地区,由绅商所创的最为著名的农业银行是江丰农工银行,由吴江士绅施肇曾、施则敬于1922年3月在吴江震泽镇创办,它是江南最早设立的兼营农业金融的银行。该行以扶农辅工为宗旨,至1927年底发放各种抵押贷款60余万元,从而使当地农民得以免受高利贷所盘剥。江丰农工银行的抵押贷款还曾经救急于蚕农。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震泽蚕丝业大受影响。不仅茧行停办,蚕农也不得不设车制丝,丝行压价收进,蚕农血本无归。对此种萧条局面,士绅沈秩安撰文呼吁“救济农民困苦”;他出资担保并组成“借本团”为农民提供借贷,此举得到了江丰银行支持。在春茧前四个月,江丰银行则积极推出短期蚕本信用贷款。新丝上市后,江丰银行仍循往年惯例,收抵新丝,籍纾民困。江丰银行每日受抵平均200多户,6月份二旬内抵出现金5万余元,帮助农民度过难关^④。而以绅商为主要力量之一的华洋义赈会,也在救灾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开渠、凿井、浚河、筑堤、筑路及其他工程建设,数目达百余项,遍及14个省^⑤。华洋义赈会的行为,对民国农村复兴和民生改良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政治衰败与失败国家的“挤压”:突变的客观条件

传统乡绅与国家共享一套意识形态和治理目标,在文化治理中完成治理行为达到国家和社会的双

① 杨珉:《苏南乡村治理的变迁(1912—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② 陆和健:《试述近代苏商的兴学活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③ 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④ 李廉深:《江丰农工银行》,载《吴江文史资料》第10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吴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第183—184页。

⑤ 徐文赋:《华洋义赈会》,公益时报网,http://www.gongyishibaol.com.

重治理效果,具有逻辑和实践的自治性。而在民国后期,由于国家政治出现方向性错误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等因素,乡绅治村的治理目标是获利,与传统的治理目标貌合神离,乡绅“土劣化”与广大底层农民群众相脱离,破坏了基层政治、损害了国家治理权威,严重侵害了乡村的执政之基。乡绅“土劣化”的动机大多是功利主义的考量,从参政之初到治理后果,整个过程就是金钱的投资收益过程,其中没有乡绅的道德许诺或义务,也没有村民的道德期待,在金钱重塑的恶性政治规则下,广大农村的治理和发展不可能寄希望于乡绅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对乡村“赤裸裸”的榨取,使得农民与国家处于对立、基层政治土劣横行,昙花一现的乡村政制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一)政治衰败“点燃”制度突变

在政治衰败的国家,政治失序、政治失衡等种种乱象,构成了制度突变的外在环境压力。制度变迁的动力,一方面来自领导者对于现实政治的认知程度和掌控能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国内外环境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危机压力。这里所说的压力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更是来自国内外环境中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结构崩溃、政治秩序的解体以及国际军事压力。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在地方自治中植入了保甲制度,主要是维持地方秩序。此时的保甲制度,主要是为了应对在前期县制改革中,地方自治成效不大以及侵华战争后社会秩序动荡的复杂局面。国民政府先后公布了《县保卫团法》《邻右连坐暂行办法》《清查户口暂行办法》《清乡条例》等,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①。事实上,保甲制度和地方自治呈现出一种既对立又融合的态势。两种制度在很多情势下是并行的:一种是停办自治专办保甲,如赣、鄂、皖、闽等省,当时是所谓的“剿匪区”,这些地区社会动乱比较严重;一种是自治与保甲并存,如苏、浙、皖等省,保甲组织与原有的自治组织处于相互“衔接”的状态,仍然保留着区乡或镇两级的自治组织,比如苏南地区大多保留着保甲和地方自治相混合的治理状态。对此,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新制度实施了快一年后,保甲制体现为强加的行政体制,这使得原有村庄的连接状态和村民关系产生混乱。显然,这样一种划分仅仅是形式上的,人们仍然按照原有的区域关系模式进行交往和生活。”^②在此过程中,一些追逐权力的乡村精英进入乡村政权,这段时期的基层政权管理者,“越来越常见的是武化和劣化的地方精英”^③。当此之时,村庄一部分精英与国家政权进一步紧密结合,在获得比以往更大权力的同时,他们在资源攫取和乡村共同体管理方面,对国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以前的乡董,从而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控制能力。可见,国家政权建设改变了乡村精英格局。

从历史制度主义在重大制度变迁路径上的解释力来看,面临危机的政治衰败国家极有可能推动制度的变迁。就近代中国而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法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富分化及土地集中等问题。在这样的“恶政”和“乱政”之下,乡村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失,农村成为经济荒野、文化沙漠,这种情况下,乡村自治无人、无钱、无力,如何能够进行呢?

(二)“失败国家”图景下的集体行动

“失败国家”(state failure)是政治学中一个古老的术语,当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国家安全、国内秩序、基本福利和社会正义的时候,往往被称之为“失败国家”。失败国家一般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路线:弱国家——走向失败的国家(failing state)——失败国家。在“失败国家”的图景下,“骚动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政治失序,政府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遭到破坏”。

民国时期的苏南农民,在乡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有所上升。无论是农民对基层土豪劣绅的斗争反抗,还是苏南地区田面、田底分离的地权结构,都使佃户对耕种的土地具有较多的支配权,也使自己在租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县政资料选编》(上册),中央政治学校,1939年第173页。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0-82页。

③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901页。

佃关系中具有和地主对抗的资格,凸显了“不服从的伦理”,即对“不喜欢的事情最终都不服从的信念”。在这个时期,农民集体行动有上升趋势,主要针对地主豪绅,主要表现在佃户集体抗租行动增加。民国时期苏南农民权力上升又一个表现是农民组织的出现。农民社会团体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导致乡村权力结构出现某种松动,乡村势力增加了新的成分。苏南农民在乡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能力也由此得到提升。

20世纪30年代以降,世界经济萧条加之出现通货紧缩,中国的农产品价格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于1931年水平58%的最低点。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因失去最基本的生存安全保障而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反抗,出现了大量农民针对土豪劣绅的抗租行为。这种反抗,类似于“农民与国家权力的正面交锋,其对基层事务的主体性没有被压制,反而激发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并对国家的压制行动展开了持久抗争,对国家权力形成了反向制约”。据《苏州文史资料》记载:“1929年至1936年,吴县旱、虫等灾害严重,粮食歉收。国民党反动当局不顾人民死活,张贴催租布告,西山、斜塘、车坊等地农民揭竿而起,聚众抗租,少则百余人,多至千人以上。1935年,车坊发生了6000人的武装抗租。据1936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苏州周边乡镇发生了121起抗租事件,其中规模在2000人以上的2起,1000人至2000人的3起。”^①

1931年发生的典当桥抗租事件,是当时一场规模较大的集体行动。这一年夏天,太仓遭受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地处常太边境的滨界乡灾情较严重,秋熟作物荒芜,在这种情境下,农民的生存遭受了严重的威胁,生计无着。常熟县东张区区长王鸿遇勾结当地土豪劣绅,强征“城余地”(即江堤旁边历来不交租的垦荒地)地租。荒年增租,对于遭灾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10月初,王潮、高怀等农民前往王义庄找王鸿遇评理未成。10月5日,长寿庙集合了千余农民,手持受灾的棉秆、稻禾前往东张租栈,途中,在典当桥遇到王鸿遇等人调集的武装警察及保安队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警察及保安队员向群众开枪射击,3人中弹身亡,多人受伤,酿成“典当桥血案”。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开义庄大门,提出惩办凶手、减租济荒的要求。在舆论压力下,入冬,苏州法院将王鸿遇及一批土豪劣绅判罪关押,一场抗租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表1 苏州农民抗租斗争简表(1936年)

日期	地点	参加人数	对象	原因及实况	结果
1.4	苏州四娄村	300余人	催甲	因前年荒歉,而催租吏逼迫农民缴租,引起农民公愤,农民将催甲住宅拆毁	报告警所
1.5	苏州沈垫桥	不详	乡长	稻熟荒歉,而催吏毫无怜惜,聚众包围乡长住宅	幸早发觉,未扰事端
4.27	苏州斜塘	2000余人	保安队	保安队赴乡巡视,耀武扬威,乡民鸣锣聚众,与保安队肉搏	死伤数人
4.27	苏州莲慕乡	1000余人	镇公所	结队至下塘请愿	公安局闻报急派警士弹压,保安队前往干涉,被农民包围
6.	苏州齐门外	200余人	警察	农民不满保安队下乡收租,激起公愤,大起冲突	农民死伤数人
6.	苏州娄门外	数百人	保甲长	因不满保甲长之催租引起风潮,聚众至保甲长家质问,并捣毁一切	保安队赶到弹压,农民亦不示弱
6.16	苏州齐门外渭泾塘	数百人	保安队	保安队勒令缴租,农民不服,与保安队冲突	保安队长急报上司

(下转第139页)

^① 苏州市档案馆藏:《解放前苏南农民的革命斗争情况》,转引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3页。